

文白对照二十子

● 贾谊新书

● 春秋繁露

● 杨子法言

5

安徽文艺出版社

装帧设计·宋文岚

责任编辑·汪洋 王玉佩

二十子 对照 文白



文白对照 二十二子



安徽文艺出版社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
地君臣固守類周室有席卷
天下包舉之勢
之心當此之時
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
外連衡





董仲舒



杨雄

文白对照二十二子

贾谊新书

汉贾谊	撰
卫绍生	校译

目 录

导读	6
卷一	14
过秦上	14
过秦中	19
过秦下	23
宗旨	27
数宁	29
藩伤	34
藩强	36
大都	38
等齐	40
服疑	44
益壤	47
卷二	50
权重	50
五美	51
制不定	54

文白对照二十二子

审微	56
阶级	61
卷三	68
俗激	68
时变	71
瑰玮	75
孽产子	78
铜布	81
壹通	83
属远	86
亲疏危乱	88
忧民	91
解县	94
威不信	96
卷四	98
匈奴	98
势卑	110
惟难	112
无蓄	116
铸钱	119
卷五	121
傅职	121
保傅	126
连语	134
辅佐	139
问孝(缺)	142

贾谊新书

卷八	143
礼	143
容经	150
春秋	163
卷七	174
先醒	174
耳痹	180
谕诚	184
退让	189
君道	192
卷八	194
官人	194
劝学	198
道术	200
六术	206
道德说	211
卷九	219
大政上	219
大政下	228
修政语上	237
修政语下	246
卷十	256
礼容语上(缺)	256
礼容语下	256
胎教	262
立后议	271

文白对照二十二子

附录:	275
传	佚名 275
旧跋	南宋·胡 价 278
《贾子序》	明·李梦阳 280
《新书序》	明·黄 宝 282
重刻贾谊新书序	
	清·卢文弨 284

导 读

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号贾生。少以文名闻于乡里,深得河南守吴公的喜爱。吴公以政绩卓著擢升廷尉,向汉文帝推荐贾谊,年方二十余岁的贾谊以此出任博士。贾谊对敏捷,受到文帝的赏识,一年之内越级提拔至太中大夫。既居其位,贾谊议论朝政,指点国事,对文帝多有启发。文帝曾一度欲任贾谊为公卿,由于周勃、灌婴、冯敬等权要极力反对而作罢,并因此而疏远贾谊,贬为长沙王吴差太傅。居长沙三年,应召回京,应对宣室宫,旋即改任梁怀王太傅。为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多次上书文帝,建议削藩。后梁怀王骑猎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痛哭流涕,年余亦抑郁而死,卒年三十三岁。英年早逝,可为叹息!

贾谊是西汉初年最为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希望引起汉文帝的重视,以期有裨益于汉朝的长治久安,促进汉朝的兴旺发达。在《过秦论》中,他明确指出秦始皇严刑峻法,仁心不施,以至四海鼎沸,神人共愤,结果“一夫作难而七庙坠,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认为有道德的人治理国家应“观之上古,验之当

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这样就能“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种鉴古知今、审时度势、变化因时的主张，也贯穿在其它文章中；在《大政》中，他淋漓尽致地阐发了他的“民本”主张，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他把天意与民心联系起来，认为“菑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菑，必与夺民时”，强调的是天意与民心的一致性。他认为，凡是与民为敌的人，终将为人们所唾弃。他说：“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视民为“至贱”、“至愚”虽然反映出贾谊的思想局限，但从“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的谆谆告诫中，仍不难看出贾谊对“民”的推重；贾谊非常推崇尧、舜、禹、汤和周文王、周武王等上古圣君，推崇上古之礼，重视贤才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得贤者显昌，失贤者危亡”（《胎教》），提出“无贤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之有也。”他把得贤才提高到与得民心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贤者而贤者归之。”民本与任贤，是《贾谊新书》中最为突出和最具光彩的两点，今天看来仍不乏借鉴价值。

出于对时政的热切关注，贾谊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其中广为人所称道的要算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了。刘邦统一天下后，大肆分封异姓王，韩信、彭越、陈豨、韩王信、卢绾、贯高等拥兵自重，先后举兵造反，使刚刚统一的汉朝处于兵祸之中。刘邦南征北战，虽然平定了叛乱，但汉朝元气

大伤。文帝即位，不汲取前车之鉴，不断地分封诸侯国。贾谊看到了藩国强大的弊端，认为分封诸侯一定要审时度势，若是“厚其力，重其权，使有骄心”，就难以让他们俯首听命。所以，若“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藩强》）。文帝部分地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分齐地为六，分淮南为三。惜其未能彻底。景帝时，晁错又继续主张削藩，触动了吴楚七国的利益，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朝的国力又一次受到严重削弱。倘若文帝当初采纳贾谊的建议，在诸侯王羽毛尚未丰满之时就削弱诸侯的力量，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吴楚七国之乱”了。

如果说“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贾谊的“安内”之策，那么，“三表五饵”可以说是贾谊的“攘外”之计。汉文帝沿袭汉高祖的“和亲”之策，对北方的匈奴一味迁就，依靠公主和亲和输送财物的办法安抚匈奴，缓和匈奴的侵扰。这无疑是向匈奴示弱。匈奴贪得无厌，一面向汉朝索要财物，一面不断地骚扰边境。当时的有识之士如贾谊、晁错等，都曾向文帝上策，以绝匈奴之患。贾谊虽曾主张迁民充边，“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麻之变”，但他毕竟是书生，他所上的“三表五饵”之计，每一点都表现出一厢情愿式的幻想。他认为，只要向匈奴示信、示爱、示义，匈奴附汉就象“弱子之遇慈母”。这未免过于天真了。至于他所说的“五表”，就更见书生之气了。

应该说，贾谊的思想主体基本上不出儒家的规范。无论是力倡“民本”，提倡任贤，还是主张施仁爱信义，反对严刑峻法，都与儒家精义相通。但是，贾谊并不是纯粹的儒家，在他的思想中揉进了较多的道家思想。他认为道之本为虚，道之末为

术；虚是道之精微，平常很少运用；术是制物之方，动静之数。这就颇有些道家的味道了。然而，在具体论述中，贾谊却巧妙地融儒、道于一体，儒与道的结合不露痕迹：

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

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之六法。六法藏内，变坏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阴、阳、天、地之动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六术》）

在《道德说》中，贾谊还提出了“六美说”：“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六行与六美基本上属于儒家思想范畴；而六理与六法则就不完全是儒家的东西了，它们更多地属于道家思想范畴。可见，贾谊的思想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但道家思想也占有相当的份量。可以说，贾谊的思想是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儒道相辅相承。这种思想状态，与汉初尚黄老之学的大文化环境是一致的。

贾谊代有高名。自西汉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始（语见《汉书·贾谊传》），历代都给贾谊很高评价。东汉班固称其“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痛悼”（同上）；北宋欧阳修则称“孝文略施其术，犹能比德于成康，况用于朝廷之间，坐于廊庙之上？则举大汉之风，登三皇之首，犹决雍裨坠尔”（黄宝《新书序》引）；南宋胡价称贾谊“危言谏议，卓绝切至。若众

建诸侯、益广梁地、养大臣有节、崇廉耻之风，后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谊所言。则谊之谋谏论建，诚有大过人者”（《贾谊新书·旧跋》）；明李梦阳则云：“汉兴，谊文最高古。然陈说治理，善据事实，识要奥，一一可措之行，盖管、晏之侔焉”（《贾子序》）。而有关贾谊的各种评价，无论如何赞美，都与这部《贾谊新书》有直接联系。然而，对贾谊的微词也与这部《贾谊新书》有关，如有人说：“三表五饵之说详见此书，谓可坐灭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过欲诱至降者，使其众渐空，非谓必以兵胜。以谊奇才得为典属国以试之匈奴，虽无可灭之理，势须渐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宋黄震《东发日抄》）。贾谊长于治国安邦，而抗敌御边则非其长。“三表五饵”之计虽非大言，但是却弥漫着浓重的书生气。文帝不纳，良有以矣。

据《汉书·艺文志》载，贾谊有赋七篇。流传下来的仅有《惜誓》、《吊屈原赋》、《鵩鸟赋》和《古文苑》所载《旱云赋》四篇，《艺文类聚》所载《虞赋》残篇，也题署贾谊所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吊屈原赋》是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时途经湘水，追悼屈原的“自喻”之作；《鵩鸟赋》是贾谊居长沙时，感鵩鸟入室而作。二赋悲愤激越，表现出与现实不妥协的精神，抒写了怀才不遇的心境，流露出较为明显的黄老思想。

贾谊的文和赋很有特色。其文善于说理，多用譬喻，文笔朴实，但又不乏铺张，读来颇有汪洋恣肆、雄浑壮阔之感；其赋素来为人推崇，《汉书·艺文志》列贾谊赋为第一大家；扬雄《法言》称“孔氏门人用赋，则贾谊登堂”；刘勰论汉赋称“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文心雕龙·诠赋》）；明张溥称贾谊“骚赋词清而理哀，其宋玉、景差之徒乎？西汉文字，

莫大乎是，非贾生其谁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其赋形象鲜明，辞采华丽，音节谐美，感情色彩浓厚，在汉赋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贾谊新书》亦作《贾子》和《新书》。《汉书·艺文志》仅作“贾谊五十八篇”，无书名，或当时尚未成集；《隋书·经籍志》载“《贾子》十卷，录一卷，汉梁太傅贾谊撰”，虽有书名，却无篇数；《旧唐书·经籍志》作“《贾子》九卷”；至《新唐书·艺文志》始称《贾谊新书》，卷数与隋志相同。宋淳熙八年（1181）湖南漕使程公刊本题《贾谊新书》，十卷，重刊本题《贾子》；明刊本或题《贾子》，或题《新书》，篇目或有差异。清卢文弨合宋明诸本重新校勘，仍为十卷，对篇目作了考订，用力尤勤，良有所得。然而，由于时代久远，《贾谊新书》非惟传抄有误，亦有增削改易，至使明李梦阳以为此书是“类贾子之言者作也”（《贾子序》）；卢文弨则认为“此书必出于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称‘怀王问于贾君’，又《劝学》一篇‘语其门人’，皆可为明证”（《重刻贾谊新书序》）。今所传《贾谊新书》经过后人增削改易，当无可疑。如《汉书》本传所载《论治安策》，在《贾谊新书》中则被肢解成数段，无复见其原貌。然而，其正言宏议却不因遭到肢解而被淹没。正如李梦阳所言：“如《治安策》摭截无复绪理可寻，乃其宏识巨议，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淹没之矣”（《贾子序》）。

明正德八年（1513），李梦阳为新刊《贾子》作序时，《贾谊新书》已是错舛颇多，李梦阳《贾子序》对当时流行的刊本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此书宋淳熙间尝刻潭州，淳祐间又刊修焉。时已称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转抄，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烦也，辄任减落其字句，久之眩或逾行窜其字句，重复讹之。士夫者